

ZHONGGUO
JINGJI
SHIXUE
LUNJI

中国 经济史学论集

■ 叶世昌 著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中国经济史学论集

叶世昌 著

商务印书馆

2008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经济史学论集/叶世昌著.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8
ISBN 978-7-100-05635-9

I. 中… II. 叶… III. 经济史—中国—文集 IV. F129-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52149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中国经济史学论集

叶世昌 著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ISBN 978-7-100-05635-9

2008年3月第1版

开本 787×1092 1/16

2008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41 1/4

定价: 65.00 元

凡 例

一、本人发表过的论文,有不少已成为拙著(包括合著或主编)《古代中国经济思想史》、《近代中国经济思想史》、《中国货币理论史》、《中国古近代金融史》、《中国金融通史》第一卷、《中国近代市场经济思想》、《中国古代经济管理思想》等书的一部分,本论集所收多是对上述专著有所超越或专著中未曾涉及的论文。同专著的某一章节基本相同的论文一般不收,收录的大都有补充。

二、本人尚有一些已发表的属于建国前 30 年的人物经济思想的论文(多数为合写),本论集未予收录,备另出专书用。

三、本论集分为六个专题组。前五组所收论文均按内容排列次序,第六组以原发表的时间为序。各文的原发表时间均在题注中注明,题目有改动的也作说明。

四、本论集所收论文,在此次结集出版时,多数有所修改、补充或删节。第六组是讨论文章,故仍保持原状,只作技术性的改动。

五、为保持所论述问题的完整性,有时将一篇论文中的部分内容搬至另一篇中,或为了避免重复而在某些篇中删去一些内容。故就每篇而言,字数或结构都可能同原发表时有变化。

六、收入本论集的论文都重新查对了引文。所引文字除化繁体为简体及统一异体字外,都不予改动。对有些难懂的字义,或加括号作解释,或加注说明。错字加括号附以正字,也有直接改正的。

七、原无新式标点的古籍,引文按本人的理解予以标点。点校本所加的标点作为参考,不尽遵从。

八、冒号下的引文,如未引至原文句号处,则于引号外用句号表示引文结束。

九、引文注明所引文献,有些须有版别。该文献集中出现时,只在同一页



首次出现处加注版别,后续者从略。所引文献的作者已在正文中指明的,注释中从略。

十、各文发表时,注释体例随各书刊的要求而定,本论集统一为一种体例。

十一、有些论文曾在不同书刊发表,本论集只标明其中的一种。

我的中国经济思想史和中国 金融史研究生涯(代序)^①

我于1929年出生于浙江省黄岩县路桥镇(今台州市路桥区)。1947年春毕业于黄岩县立中学(今黄岩中学)高中部。同年夏考入复旦大学银行学系。在大学学习期间,正值新中国诞生的前后,复旦大学在地下党的领导下,学生运动极为高涨。我参加了学生运动,并在运动中受到了深刻的教育。1951年7月毕业,留校任银行专修科助教。1952年暑期院系调整,复旦大学商学院调整到上海财经学院,我成为上海财经学院的教师,并于1953年秋被财院派到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经济史专业的研究生班学习,因生病,中途休学。

我上过私塾,有古文基础,在中学时又看过许多中国历史小说,养成了对中国历史的浓厚兴趣。看到彭信威教授的新著《中国货币史》(群联出版社1954年版,后又两次增补,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先后出版)后,感到这可以成为我的一个研究方向。在我负责上海财经学院财政信贷系资料室工作期间,财政信贷系买到了一批中国历代货币实物,系领导决定由我负责筹备展出。我以群联版《中国货币史》为依据,为各种钱币配写了详细说明。这一中国历代货币展览在1956年的上海财经学院校庆期间举行,受到了各方来宾的好评。

1958年,我下放上海市宝山县炮台湾劳动锻炼,1960年调回。这时,原上海财经学院已撤销并入上海社会科学院。不久,成立新的上海财经学院,财政信贷系改名为财政金融系,我在财政金融系任教。

① 原载熊诗平、徐边主编:《经济学家之路》第4辑,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略有补充。原有小标题为编辑所加,突出各时段的主要研究方向。因难以显示各时段所述内容的多样性,故仍予删除。



1959年,由巫宝三教授等编写的《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和经济资料选辑(1840—1864)》一书出版。学习此书以后,我对中国经济思想的研究也产生了兴趣。我觉得鸦片战争前后中国的货币思想内容丰富,且具有典型意义,反映的是中国关于货币本质论的两个派别——金属主义和名目主义的尖锐对立。为了正确评价这两派的货币理论,我认真阅读了一些货币理论著作,对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用功尤深。我不以《资料选辑》中已选的资料为满足,进一步搜集史料,有不少新的发现。在此基础上,我写成了《鸦片战争前后我国的货币学说》,约8万字,由上海人民出版社于1963年出版。

同时,我还对中国货币史问题作了一些研究,曾在1963年2月5日的《解放日报》上发表长文《大骗局 大掠夺 大灾难》,揭露国民党统治时期的恶性通货膨胀政策及其后果。论文发表后引起了读者的反响,如读者张方仁先生通过《解放日报》赠给我一本他所著的《金融漫纪》,1963年2月12日的《新民晚报》上发表了署名文龙的《钞票贴在挽联上》作为对拙文的呼应。

为了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我着手收集解放前出版的中国经济思想史的著作,了解本学科的产生和发展情况。1962年和1963年,胡寄窗教授的《中国经济思想史》上、中两册相继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研究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的最新成果,我认真进行了学习。在学习过程中,也产生一些不同看法,投稿《学术月刊》同胡先生商榷,发表后胡先生亦为文辩驳。在古代文献中,《管子》的经济思想特别丰富。研究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我决定先从《管子》下手。参考郭沫若先生等著的《管子集校》,在本系教师李民立先生的参与下,我们在1964年完成了一部《〈管子〉经济思想研究》书稿(书稿已交出版社,后因形势变化而未出版)。同时,我对其中颇具个人研究心得的关于对《管子·轻重》的论述还写成了专文《论〈管子·轻重〉》,在《经济研究》1965年第1期发表。

《管子·轻重》是《管子》书中的最后一组文字,共19篇,现存16篇,主要以国家干预市场和商品流通为议论内容。西晋的傅玄曾说过“《轻重》篇尤鄙俗”的话,但近代以来的《管子·轻重》研究者一般都对它作了肯定的评价,认为它主张以国家调节商品流通、平衡物价为目标。经过深入研究后,我认为实

际情况并非如此。它的实质性的主张是要由国家控制市场,人为地造成物价的剧烈波动,从中获取厚利,反映了前资本主义社会中国家商业资本和国家高利贷资本的活动规律。论文发表后,得到了《管子》研究专家马非百先生的认同。多年以后,他和我建立了通信联系,在信中对拙文作了很高的评价。他说拙文“是从(唐)尹知章《管子》的最早注释者)以来最懂得书中内容的第一篇”(1976年4月8日来信);又说他在这篇文章的启发下,在自己的《管子轻重篇新论》(1979年由中华书局出版)中增加了《关于管子轻重之理论的体系》一节(1980年5月20日来信)。

1964年开始了“四清运动”。10月,我随上海财经学院的部分师生到上海市金山县参加“四清运动”。八个月后又参加了上海市南汇县的“四清运动”。“四清运动”尚未完全结束,“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1974年4月上海财经学院又被撤销,大部分教师并入复旦大学。这样,我又回到了母校,在政治经济学系(现经济学院经济学系)任教。

在复旦执教后,我先是开中国经济史课,后来改开中国经济思想史课,并着手编写中国经济思想史的教材。首先编的是先秦部分。我认为编教材不能抄现成的观点,应以自己的研究为基础。通过研究历史文献,的确有新的发现。如照历来的说法,战国时产生以农为本、以工商为末的观点,只有唐庆增教授在1936年出版的《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卷提出《管子》书中的“末”不是指一般工商业。我则进一步发现不仅是《管子》,《商君书》和《荀子》中的“末”也不是指一般工商业,而是指奢侈品生产。这三书中都提到“禁末”,都不是要禁止工商业。韩非开始将“末”的概念扩大到一般工商业,以工商为末到西汉才成为流行观点。关于《管子·轻重》的著作年代在我发表于1965年的《论〈管子·轻重〉》中还认为是产生于战国时期,这次通过对战国时期古籍的综合考察,已转而确信产生于西汉说。所以我在先秦的中国经济思想史中只谈《管子》中属于战国时期的经济思想,不包括《管子·轻重》和《管子·侈靡》中的经济思想(对《侈靡》篇产生时期的看法后来有变化)。书稿写好后,又以它为基础,同上海重型机械制造公司的工人写作组合作编写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先秦部分,对原书稿有所补充和修改。稿子完成时,已是粉碎“四人帮”的日子了。

“文革”结束后再恢复上海财经学院,我仍留在复旦。

粉碎“四人帮”后,教学和科研逐步恢复正常。我再一次对先秦稿子作了修改,定名为《中国经济思想简史》上册,由上海人民出版社于1978年出版,作者署名为“编写组”,以陈绍闻、叶世昌为主编。由于“文革”中“左”的影响不易一下子清除,书中还存在一些“评法批儒”的影子。随着拨乱反正的深入,对书中的有些不妥提法,在重印时作过一些修改。接着是写《中国经济思想简史》中、下册。因教学急需,先写下册。下册是近代部分,以1919年为下限(当时已学习过赵靖、易梦虹教授主编的《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上、中、下册,中华书局1964年至1966年出版,也以1919年为下限)。我在撰写《鸦片战争前后我国的货币学说》时,对近代中国的经济思想资料已多有接触,可以说是为编写《中国经济思想简史》下册作了相当的准备,故写起来比较顺利。写成后,请陈绍闻教授审稿,由上海人民出版社于1980年出版。

《中国经济思想简史》中册是秦汉以后的古代部分。《管子·轻重》的经济思想放在中册,内容是1965年发表的《论〈管子·轻重〉》的延续和发展。当时,明中叶后已产生资本主义萌芽是主流观点,我也相信,但我不认为明清之际的有些思想家已是市民阶级的代表,仍将他们定为地主阶级的思想家。如黄宗羲的“工商皆本”,王夫之的“故大贾富民者,国之司命也”,都不是市民阶级观点的表现。我对这些话的含义作了不同于流行观点的解释,现在看来仍是正确的。中册也请陈绍闻教授审稿,由上海人民出版社于1983年出版。

《中国经济思想简史》三册共约64万字。相对于上册而言,中、下册已经不算“简”了。这部书出版后被不少高校用作教材或参考书,曾多次重印。此书获得了上海市(1979~1985年)哲学社会科学著作奖。

上海人民出版社有意重印已故彭信威教授的1965年版《中国货币史》,但认为书中有史实错误,对史料的运用解释也存在一些问题,另外还需补充1965年以后的新的研究成果,于1978年7月派两位编辑到学校来找我,邀我对此书作些必要的修订。我因忙于写《中国经济思想简史》,曾再三推辞,最后因兴趣所在,还是接受了邀请。这样我又重新进入了中国货币史的研究领域。我在上海图书馆胡群耘女士的协助下,对书中所引的史料进行逐条核对,发现

了不少引用史料或排印的错误。到1981年,终于完成了对《中国货币史》的增订工作。但因涉及已故作者的著作权问题,上海人民出版社最后仍放弃了出版增订本的打算。

增订版没有出,对此我并不在意。因为通过大量查阅资料,使我在中国货币史上的学力大有增进,这为自己研究中国货币史打下了扎实的基础,劳动并没有完全白费。我还想到,在学术观点上见仁见智在所难免,改动原作者的观点很可能招来非议,不出版此书稿对我来说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因此反而感到庆幸。不过,对于确凿的史料或印刷错误,后来我写了一篇《对〈中国货币史〉的若干订正》,发表于《中国钱币》1989年第3期。

1980年我被评定为副教授。1982年接友人周成启来信,约我参加贵州省金融学会、贵州省金融研究所组编《中国货币理论史》一书的编写,我欣然接受。但实际上贵州省金融学会并无这方面的研究者,也无这方面的资料积累。故先由我写出《中国货币理论史》的古代部分,经贵州省金融学会组织专家讨论并经我修改后作为上册,由中国金融出版社于1986年出版。

1985年我被评定为教授。1986年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为中国经济思想史博士生导师,于次年始招收博士生。当时有些学者研究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已取得了可观的成果。我申请到国家教委“七五”研究规划课题《中国古代经济管理思想》。此书由我主编,按专题分述中国古代有关经济管理思想的发展,约28万字,由复旦大学出版社于1990年出版。接着又受上海古籍出版社之约,主编了一部《十大理财家》,作为《“十大”系列丛刊》之一。此书主要由博士生和硕士生分工撰写,我只是作了策划和修改工作,并写了一个简短的《前言》。编成后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于1992年出版。从这一年开始,我获得了政府特殊津贴。

当时最主要的还是要完成《中国货币理论史》的下册即近代部分(以1949年为下限)。它于1990年列入国家教委第三批博士点科研基金资助项目。下册的时间跨度只有109年,但比写时间跨度达两千余年的古代部分要困难得多。古代的货币理论发展缓慢,称得上货币理论的总量并不很多。我已写过中国古代的经济思想史,又熟悉中国古代货币史的资料,只要掌握好取舍和评



价的标准,就能顺利地完成。近代由于西方的货币制度和货币理论的传入,中国的货币理论著作大增。特别是1919年至1949年,关于货币的论文、专著和译著很多,要把握所有主要资料,理清货币理论的发展脉络,没有多年的潜心研究是难望有成的。不仅理清脉络不容易,就是搞清一些学者的生平也大不易。在近现代的人名辞典中,许多学者或是榜上无名,或只有早期的一些情况。因此还必须从各种书中寻找线索,包括一些学校的同学录和一些单位的同仁录等,有些还要向知情人了解,然后将收集到的各种材料综合起来,勾勒出主要经历。

参加下册的写作,除我外还有李宝金(现为中共青岛市委党校教授、副校长)和钟祥财(现为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三人分工撰写,再由我统稿。下册完成交稿时已是1992年,由中国金融出版社于1993年出版。此书出版前未经作者校对,存在着一些错改、错排、漏排的情况。我既感谢中国金融出版社较快地出版了此书,又为存在一些错漏的情况而感到遗憾。《中国货币理论史》上、下册共约52万字,上、下册的字数比例为1:2。此书于1995年获得了全国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著作一等奖。

研究货币理论要以马克思主义的货币学说为指导,但也要考虑到马克思主义的货币学说产生于百余年前,当今的货币流通实际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因此马克思主义的货币学说也要发展,不能一概照搬原有的结论。例如纸币是金属货币的代表,这在金属货币流通的时期无疑是正确的。而在世界范围确立了纸币流通制度以后,纸币是否还是金属货币的价值符号呢?答案应该是否定的。1964年我曾写过一篇《货币购买力和人民币的基础》,发表于《经济研究》1964年第10期。当时我已否定人民币代表黄金,按照马克思的货币学说和现实情况,推断出了这样的观点:“人民币客观上是一种货币商品的符号,代表着一种货币商品的价值。”所谓“客观上”,意思是说这种货币商品实际上已被抽象掉了。

20世纪80年代,学术界又兴起了“当今的纸币代表什么”的讨论。这时仍有坚持纸币是黄金的代表的学者。武汉大学李崇淮教授发表《论货币形式的新阶段》(《中国社会科学》1982年第2期),指出纸币已不代表黄金,提出

了一个纸币代表商品总价值的等分值的理论。我赞同李先生的纸币已不代表黄金的观点,但不赞成纸币代表商品总价值的等分值的结论。我先是提了两点不同意见,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1982年第5期。接着李先生写文章申述其说,我也进一步为文阐明自己的观点,形成了“非黄金派”之间的多次争论。1985年,中国金融出版社出版了李崇淮著的《论当前的货币形式问题》,其中也收录了我的商榷文章。后来我又写了一篇《黄金非货币化和人民币代表的价值》,发表于《复旦经济论丛(1988)》(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年出版),继续说明自己的观点。至于等分值理论为什么不能成立,说来话长,有兴趣的可以复按原文,这里就不再噜苏了。在讨论中,我对当今纸币代表的价值作了这样的论述:“纸币是价值符号,它代表一定的价值……问题在于代表什么价值。我认为它既不代表任何一种具体的货币商品的价值,也不直接代表同它相交换的商品的价值,而是代表在流通中形成的、客观上存在的、没有货币商品实体的抽象价值。”(《财经研究》1983年第2期,又见《论当前的货币形式问题》,第164页)纸币代表的价值在流通中形成,这有点像名目主义者的货币职能价值论。但名目主义的职能价值论是包括金属货币的,否认货币金属自身的价值,我这里仅指当今的不兑现纸币的价值形成,两者不是一回事。我不是货币名目论者。

自1986年起,复旦大学出版社着手组织校内外专家集体编写大型学术丛书——《中国学术名著提要》,由我负责其中的《经济卷》。在众多专家的参与下,《经济卷》顺利完成,于1994年出版。其中收录先秦两汉至1949年以前中国历代经济名著222部(包括单篇),约68万字。

我在解放初就提出了参加中国共产党的申请,时间已过去了几十年,仍是非党人士。但我的初衷不改,努力做好自己的工作。1994年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愿望,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名党员。

要进行史学的研究,我始终坚持史料的搜集,这是进一步加工的原料。为此,我买了大量有史料价值的书,包括各种史书、文集、笔记和小说等。买来的书多数要翻阅过,抄录其中有用的资料,否则将来想用时仍会找不到。如《续资治通鉴长编》我买了一套,从其中抄录的资料订成了一本,以后要用这套书

中的资料先从手抄本查起,再找原书核对,就方便得多了。但是史料浩繁,个人的买书能力有限,非利用图书馆的藏书不可。这只能到图书馆中抄录,有复印机可以复印资料后,有些书因为其中我需要的资料比较分散,仍必须用手抄。从 2005 年开始则改用数码相机拍摄,工作效率大为提高。

《明实录》和《清实录》是我花了很大工夫抄录的两部大书,共 7 000 余卷。书中有丰富的货币、信用史料,多数未被过去的学者引用过。郭厚安先生曾编过一部《明实录经济资料选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9 年出版。南开大学历史系曾编过一部《清实录经济资料辑要》,中华书局 1959 年出版。两书的共同之处是都未收关于货币的资料,前者根本没有收,后者只在《铜铅鼓铸》中涉及铸钱的事。我花了几年的时间,在复旦大学图书馆逐卷翻阅了明清《实录》,抄录其中有关货币、信用及其他可能对我有用的资料。这为我研究明清的金融史打下了重要的基础。

掌握史料越充分,越有可能形成自己的观点,得出正确的结论。以下不妨举几个小例子说明。(一)1985 年江苏高邮出土一批两宋铁钱和部分铜钱,其中有一枚纯熙元宝铁钱,但两宋并无“纯熙”年号,因此出现了一些对此钱的猜测性的解释。我查了《皇宋中兴两朝圣政》等史书,发现宋孝宗曾下诏“改元纯熙”,不久又决定“改元淳熙”,可见纯熙元宝是宋孝宗拟用年号的年号钱。这一发现在《中国钱币》1988 年第 2 期发表。(二)元末有一种“权钞钱”,钱上分别铸有“伍钱”、“贰钱伍分”、“壹钱伍分”、“壹钱”、“伍分”等字。这些数字究竟代表什么,迄无定论。我从大量元朝史料中得知,元朝纸币一贯又称一两,一百文又称一钱,十文又称一分,因此提出“权钞钱”中的数字分别代表纸币 500、250、150、100 和 50 文,在《中国钱币》1994 年第 4 期发表。(三)《明会典》、《明史》都说嘉靖年间曾补铸洪武至正德的九种年号钱,每种 100 万锭(一锭为 5 000 文),嘉靖钱 1 000 万锭,共 1 900 万锭。相信这一记载的人不少,也有人表示怀疑。我从《明世宗实录》中查到,嘉靖三十二年确有此上谕,但不久大学士严嵩即上奏说,铸钱 1 900 万锭需工料银 3 282 万余两,而户、工部的存银只有 163 万余两,全部拿来铸钱尚不到十分之一,要求只铸嘉靖钱,世宗准奏。由此可知明嘉靖时的补铸钱上谕并未成为事实,此结论在《中国钱币》

1986年第2期发表。这些结论都以史料为依据,能起一锤定音之效。

20世纪90年代初,洪葭管先生主编一部《中国金融史》教材,我参加了古代部分的编写,约8万字。此书由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于1993年出版。1992年,中国人民银行系统的领导和专家李飞、赵海宽、许树信、洪葭管诸先生策划主编一套多卷本《中国金融通史》。其中第一卷是先秦至清鸦片战争时期的金融,邀我负责编写。这正合我的心意,我有长期的资料积累准备,写这卷书困难不大。虽然如此,真的写起来仍花了约三年的时间,于1996年交稿。1997年《中国金融通史》主编和中国金融出版社组织一批专家对书稿进行了审议。事后我参考审议中的意见对书稿进行了一次修改,后来又校过一次清样。但到正式出版时已经是2002年了,全书约53万字。

《中国金融通史》第一卷从交稿到出版共经历了六年时间,这期间我又进行其他一些著述活动。

一是参加了《中国历代货币大系》第8卷《清民国银锭银元铜元》的主编工作。《中国历代货币大系》是上海市钱币学会发起、组织编纂的一部大型多卷本图书,有文有图,计划分12卷,由学会的名誉理事长马飞海任总主编。参加《清民国银锭银元铜元》卷的主编有三人,我是其中之一,主要负责书中文字部分的撰写和编辑工作。该卷由上海书店出版社于1998年出版。我还为《中国历代货币大系》其他卷写了若干论文。

二是在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启发下,我决定写一部《中国近代市场经济思想》。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使中国市场经济有了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许多有识之士提出了种种学习西方、发展中国经济的理论和主张,其中有很多同市场经济有关,对今天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借鉴作用。1993年经我申请,此课题列入了国家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我约本系施正康副教授共同承担此项目,在分头撰写的基础上由我进行统稿成书。此书分专题按时间顺序评述中国近代(以1949年为下限)有关市场经济思想的发展过程,涉及的人物很多。全书约27万字,由复旦大学出版社作为新编经济学系列教材的一种于1998年出版。

三是以原来的《中国经济思想简史》下册为基础,改写成《近代中国经济思



想史》(“近代”放在前面是为了避免和已出的两种《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重名)。《近代中国经济思想史》较《中国经济思想简史》下册人物有增加,内容更充实,结构更合理,但仍以1919年为下限。增加的人物中,有一位是钟天纬,他的主要著作《刖足集》内外篇可能许多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者尚未见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有关钟天纬经济思想的评述多是我及我的学生们所为,研究钟天纬的经济思想似乎成了我们的“专利”。《近代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出版时间也是1998年,出版单位仍为上海人民出版社。

四是1997年申请到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九五”规划课题《中国金融史》。我之所以申请此课题,一是因为《中国金融通史》第一卷迟迟未出;二是因为第一卷仅限于古代,我还想写一部包括近代(下限为1949年)的中国金融史。我约请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统计研究处资料室主任潘连贵高级经济师一起来完成这一课题。书中的古代部分是《中国金融通史》第一卷书稿的简编,其中还增加少量第一卷未曾写到的内容。近代部分是重点,约占全书的三分之二。我们的合作充分发挥各人掌握的资料优势,做到了内容充实,条理清楚。此书仍由我统稿,在《序言》中还谈了对一些金融史问题的看法。书稿完成后,定名为《中国古近代金融史》,约44万字,由复旦大学出版社作为“复旦博学·经济学系列”的一种于2001年出版(比《中国金融通史》第一卷的出版还早一年)。此书获得上海市第六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著作三等奖。

此外,我还在进行其他旧著的修订或改写工作。《中国货币理论史》是我念念不忘要出新版的书。我将原书一页一页地剪下贴在白纸上,边贴边修改,并增补一些新的内容。原分上、下册,修订后改为一册。完成后征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的同意,将书稿交给该社出版。后因出版社人事变动,出书计划有变化,书稿被搁置。2002年春,我的学生,时任中国人民银行厦门市中心支行行长的欧阳卫民博士邀我去厦门协助建立货币文化馆。在他的支持下,《中国货币理论史》得到了招商银行厦门分行和厦门经济特区金融学会的资助,准备交由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回沪后,从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取回书稿,对书稿作了再一次的修订,然后交稿。新版《中国货币理论史》由厦门大学出版社于2003年出版,分精装和平装两种。它的出版,了却了我的一桩心事。此

书获得上海市第七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著作三等奖。

《近代中国经济思想史》出版后,我又动手编写《古代中国经济思想史》。先写出先秦部分,它以《中国经济思想简史》上册为基础,但增加了很多内容,对观点有所修正。如对西周的社会性质不作肯定(原来定为奴隶制),对儒家思想的评价清除了“左”的影响,提出对有些难以确定其所代表的阶级或阶层的思想家(如老子、墨子)就不必硬要予以确定,将原来放在西汉时期《管子》侈靡论移至战国时期等。秦汉以后部分以《中国经济思想简史》中册为基础,有删有增。如东汉《太平经》的经济思想我认为不重要而予以删除,增加的有贾思勰、李雯的经济思想等。关于“资本主义萌芽”的提法,我在数年前出版的著作中就已避而不谈,在《古代中国经济思想史》中也予以删除。此书由复旦大学出版社作为经济学系列的一种于2003年出版。古、近代两书共约72万字。《古代中国经济思想史》获得第四届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三等奖。

2002年夏,我因二女儿遭遇车祸而受到刺激,心绪不宁,加上用电脑过度而得病,约一年不能正常工作。《中国货币理论史》(新版)、《古代中国经济思想史》两书出版前的有些工作是在病后完成的。后来身体逐步恢复,仍抓紧科研工作。上面没有提到而实际已在进行的还有《建国前三十年的中国经济思想》一书。前已谈到,中国经济思想史的近代部分以1919年为下限。也就是说,中国经济思想史的近代部分还少写了30年。这30年的中国经济思想很丰富,中国的发展经济学即形成于此时,足可以另写一部书。1993年我曾申请到国家教委“八五”研究规划课题“20年代至40年代的中国经济思想”,先由博士生们分工写出部分初稿,再由我修改定稿,其中有些已以论文的形式在刊物上发表。这是我准备继续完成的一部书。

2004年1月,以吴景平教授为主任的复旦大学中国金融史研究中心成立,我被推为中心的名誉主任。2005年,我被批准为国家清史纂修《金融篇》项目的主持人。从此我花很多时间在清代金融史的研究上。我逐日查阅《申报》,发现了许多以前未曾掌握的货币金融史料。第五组的多篇论文大量引用了《申报》的资料,有许多是金融史学界的首次引用。



以上主要谈我独著或为第一作者的著作。此外我还是《辞海》的分科主编,《经济大辞典·中国经济史卷》和《穆藕初文集》的副主编。我发表的论文较多,不少论文的内容已融入出版的书中,或成为书中的一部分;也有一些则书中仅有部分涉及,或完全没有涉及。选入本书的只是一小部分,其中最早发表的一篇是1957年的《七三龙洋质疑》,距今已半个世纪。

在参加学术团体的活动方面,我曾参与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研究会、上海市钱币学会、上海市经济史学学会和《管子学刊》的发起。在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任理事,从1988年开始任副会长至70岁(1999年)时止。在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研究会任理事、学术顾问。在上海市钱币学会任常务理事,从1987年开始任副理事长至今,并主编会刊《钱币博览》。在上海市经济史学学会任首届副会长,并代表学会担任过一届上海市社联委员。此外,还任中国钱币学会理事兼学术委员等。